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的生成

王晓云

(江汉大学 政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56)

摘要 在文化哲学的视域下,文化模式的成功转型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力是深刻而持久的。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社会转型的复杂态势,通过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文化模式和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文化批判,以及对文化模式的历史变迁分析发现,生态文明文化模式是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文化模式之后出现的新型的文化模式。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自觉构建以“生态和谐”“以人为本”和“和而不同”为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文化模式,真正实现现代工业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转型与超越,对于全面推进两型社会的建设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生态危机;环境正义;科学发展观;生态理性

中图分类号:G 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2)04-0095-05

在文化哲学的视域中,文化模式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态。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如果忽视文化模式的规制作用,将会遇到强大的文化阻滞力。为此,必须深刻反思生态危机产生的文化根源,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的生成,实现文化与自然、社会、人的和谐互动。

一、危机中孕育生态文明的时代精神

当代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在《地球的终结:关于现代环境史的一些观点》一书中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1]。要解除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文化对自然的影响。

1. 生态和谐是对现代工业文明文化批判的思想成果

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既是现代工业文明文化模式的两大主导性精神,也是这种文化模式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和冲突的根源。随着工业化的普及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这种内在矛盾所引发的文化危机日渐显现。最早嗅到工业文明文化危机到来的是一批思想敏锐的哲学家和思想家,1918年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一书中已全面地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2],从20世纪初至今,这场文化批判主要围绕以下3条线索展开。

(1)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批判。1967年,美国历史学家Lynn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颇具影响的文章《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3]。他认为,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它构成了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科学技术,赋予人类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掠夺、统治自然的神圣权利。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活动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一切应当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事实上把人类种族利益凌驾于整个自然规律之上。过度地劫掠自然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从而引起了一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2)工具理性的文化批判。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文化模式陷入了深刻的文化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以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把文化批判的矛头指向使现代工业文明走入歧途的“工具理性”。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同时存在着2个截然相反的历史进程。一方面,人凭借理性不断超越自然的束缚,自由度不断增强,理性成为新的霸权,理性从手段和工具变成人类盲目追求的目的;另一方面,技术理性不仅没有成为人们所期望的将人类带入自由王国的法宝,相反,它甚至成为以操纵人类为宗旨

的“文化工业”。当代科技不仅成为统治自然的工具,而且也变成统治人和社会的工具,主要表现在技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性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最终导致整体生态系统的崩溃。

(3)生态中心论的文化批判。20世纪中后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亮丽的风景线,是当代最有建设性的文化批判理论之一。与以往的文化批判理论不同,他们认为生态文明不是要人们回到原始文明状态下的生态中心主义,探讨生态危机的本质原因不能脱离生产方式性质和社会制度对环境的制约维度来分析,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观点,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断言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下建设生态文明是不可能的,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权力关系,合理地分配和使用自然资源,提出了“环境正义”的理念,倡导“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口号,构建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正如国家环境保护局副局长潘岳所说“生态社会主义由于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发现”^[4],对于我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2. 生态革命是应对工业文明危机的自觉行动

当今生态文明已经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和形而上学的抽象理论,已经演变成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广泛而持久的“生态革命”,这场革命涉及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社会环境法规和制度等领域,引发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的深刻变革,它将使人类从工业革命形成的工业文明社会,跨越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的社会中。早在20世纪中叶开始,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自发成立国际性的组织机构,在全球设立办事机构使之常态化、制度化,并开始发挥积极的监督、指导和促进作用。如“大自然保护协会”“绿色和平组织”“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绿党”和“西欧保护生态青年组织”等。进入21世纪后,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和国际公约的问世,标志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日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这场生态革命中孕育了强化了生态文明的时代精神,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保护环境”成为生态革命的首要任务,引发了世界各国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20世纪90年代

以后,各国政府开始通过立法调整发展战略。1996年德国实施了《物质闭路循环与废物管理法》;2000年日本实施了《促进建设循环型社会的基本法》;欧盟各国大力调整能源结构,计划至201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从目前的约6%提高到12%,风力发电占总发电量的22%;2005年法国通过了《环境宪章》,将环境利益上升为国家根本利益的高度;200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亦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

(2)“可持续发展”在生态革命中实现了价值认同,成为人类共同的行动纲领。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有153个国家及欧洲共同体正式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确立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应是人类共同的行动纲领。2002年,在南非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执行计划》和《约翰内斯堡政治宣言》,确定发展仍是人类共同的主题,进一步提出了经济、社会、环境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以及水、能源、健康、农业和生物多样性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五大优先领域。

(3)“环境正义”在生态革命中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人们呼吁建立世界政治经济的新秩序。2009年12月在丹麦首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192个国家谈判代表出席峰会,达成了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作出了安排。这表明生态革命已经不再是非政府组织和民间人士发起的绿色和平运动,而是世界各国政府通过合作的方式联手拯救地球。“气候政治”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体现了国际社会要求以环境正义为目标,变革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良好愿望。

二、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

“文化是人类的‘第二天性’每个人都必须首先进入这个文化,必须学习并吸收文化。”^[5]如果说文化是人的“第二本性”,那么,文化模式对于人类而言,就是一种给定的、自在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第二自然”。在文化哲学的视域中,“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在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传统习俗和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或者说基本的生存方式或

样法”^[6]文化模式对人的存在形成一种无形的、潜在的外在于个体的强制力,具体表现为主导性文化的群体价值观对个体行为的包容和整合及赋予个体的行为以根据和意义,为此,有必要从文化模式的历史变迁中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趋势。

1. 从文化模式的历史变迁看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

通常人们把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划分为三大文明形态,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有三大主导性的文化模式,即原始渔猎文明、传统农业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从3种文化模式的变迁中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经历了依存、利用、掠夺3个发展阶段。

(1)原始社会的文化模式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文化模式。原始人的生存方式主要以简单的采集、农耕和狩猎等自在、自发的实践活动为特征。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一方面,人类直接或通过简单的生产工具从大自然获得所需的一切,另一方面人在自然面前是渺小的,人们顺应自然的同时也在与自然力量抗争中生存和发展。自然为宇宙万物的中心,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种原始的和谐状态。但是,原始人怀着“敬畏自然”之心,凭借“万物有灵”“天人感应”等无意识的直觉思维,通过创立如原始巫术、图腾崇拜、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等原始的文化精神,与庞大、盲目而神秘的自然力量进行沟通与抗衡。

(2)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农业文明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人们凭借经验、习惯、传统和天然情感等为生存方式的文化模式。随着青铜器、铁器的使用以及社会大分工的出现,人类开始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改变自然,使得人与自然关系进入了开发利用阶段。在这一时期,由于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有限,还没有对自然造成较大的破坏。但是,与原始社会相比,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精神世界和社会有了巨大的进步。随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人类创立了哲学、艺术、宗教和科学等多元的文化形态,人类开始认识和利用自然并具有了独立的精神世界。

(3)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它与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有着本质区别,是以理性和科学为基础,集理性和人本精神于一身的自觉的生存方式。技术理性倡导人对自然的技术征服,把人的生存基础从对自然的依赖转变为对人的理性和创造性的依赖,展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于自然的超越,人类开始野心勃勃地“征服自然”。因此,这一时期人类以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目的,人对自然的关系是掠夺性和破坏性的,表现为人类中

心主义的价值取向。正如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对现代性所做的深刻反思:“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7]西方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同时并存的悲剧,需要反思人类现有的生存意义和生存方式。

2.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中国文化转型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文化模式是一种生态理性的文化模式。它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形态;是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实现环境正义为经济社会发展根本目标的社会文明形态。从文化模式的变迁中看人与自然关系,人类社会经历了渔猎和农业文明的“天人合一”的原始和谐状态、现代工业文明中人本主义倡导的“人定胜天”的人类中心状态、当代生态文明追求的“天人和諧”的境界。当代生态文明是人类反思人与自然关系之后的一次否定之否定。生态危机的出现说明人类对自然掠夺式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时代呼唤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取而代之,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文化转型的必由之路。因此,生态文明文化模式必须克服工业文明文化模式的弊病,应该着力解决以下3个方面的矛盾。

(1)以环境正义性为核心,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利用工业文明的已有成绩,使人们从盲目的占有和异化消费中摆脱出来,恢复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实现生态和谐基础上的人类发展。”^[8]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不能脱离工业文明所依托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原因;提出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逻辑与生态文明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前提就是要破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全球权力关系,以实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环境正义为核心,克服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因此,中国在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

(2)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实现科学精神与人

文精神的统一。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诚然,科学技术可以帮助人们对抗贫困和衰颓,造福人类并推进社会进步。但科学技术的滥用导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日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9]科学技术有时“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10]可见,科学技术没有人性,它需要人文精神的约束、规范和引导。只有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才能真正发挥人的主体创造性。因此,中国在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时,势必要解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矛盾问题。

(3)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前提,实现生态理性与人的利益的统一。现代工业文明文化模式的弊端是技术理性背离人的价值约束,从而造成人的异化。生态文明文化模式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新型的文化形态,理性依然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但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理性,而是要如何实现从技术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转变。人们必须转变以物质利益的满足为标准的幸福观、消费观和价值观,引导人们从创造性的生产实践中获得幸福和快乐,生态理性的运用还需要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和价值观念的导向相契合。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时,势必要解决在生态理性与人的利益之间的矛盾问题。

三、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的重要表征

当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进行的,而社会主义(含共产主义)社会是以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因而与生态文明的时代精神是高度契合的。由于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也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它所阐发的“生态和谐”的生存方式、“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以及“和而不同”的行为方式,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的重要表征。

1.“生态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中全新的发展方式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第一次对发展的内涵和标准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科学发展观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和生态革命中的思想资源,提出了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所谓“全面协调的发展”注重了效率和质量统一的内在标准,注重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和谐,注重效率与公正之间

的和谐,注重局部发展与整体发展之间的和谐,注重当代与后代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平衡问题。可见,全面协调的发展深刻地诠释了“生态和谐”和“环境正义”的要求。同时,生态危机的出现提醒人们在发展中注意自然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要求人们实现从由物欲(工具理性)支配的盲目发展到由生态理性指导下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转变。因此,“生态和谐”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生存)方式是生态文明首要的特征。

2.“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中的核心价值观念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含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就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坚持尊重自然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故而,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与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和西方个人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不同。其一,以人为本不是把人类的利益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而是在尊重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把人类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人类的局部利益与根本利益结合起来。其二,以人为本不是以满足资本追逐利润的个人利益需求为目标的发展,而是为了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要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前提。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理性的运用过程中,需要社会制度的利益分配机制和价值观念的导向相配合,才能有效抑制技术理性的异化和资本的无限扩张,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理智地选择适合人类的生活方式。

3.“和而不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中的行为方式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蕴含了浓厚的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等辩证思维的文化模式特征,是中华民族实践智慧和行为方式的现代体现。所谓“统筹”其实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1]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现代体现。后来孔子将其发展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2]的伦理思想,他强调“和”与“同”的区别,“和”是包含了差别和对立的同一,即强调整体统一性的同时又尊重个体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存在,既强调事物之间和谐共生的整体关

系,要求人们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重点,这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倡的“建立动物多样性伦理”的价值取向高度契合;同时,“和而不同”辩证思维的文化模式也与西方工具理性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文化模式截然不同。所谓“兼顾”是“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的体现,要求人们要妥善把握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矛盾关系的平衡点,才能有利于化解矛盾,以充分调动各方面因素的积极性。为此,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文化模式过程中,必须注重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科学发展观既是化解全球性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的重要法宝,也是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可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从历时态文化模式的视角看,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现代工业文明之后的新型的文明形态;从共时态文化模式的视角看,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在具有中华民族心理特征的文化模式上的文化转型。生态文明文化模式的构建,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两型社会为载体,吸收中西方思想文化的精华,从而顺利实现中国传

统文化模式的现代转型和对现代工业文明文化模式的超越。

参 考 文 献

- [1] [美]唐纳德·沃斯特. 地球的终结:关于现代环境史的一些观点[M]. 薛良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2]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M]. 吴琼,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2006.
- [3] LYNN W.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J]. Science, 1967(155):56-57.
- [4] 潘岳. 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J]. 绿叶, 2006(10):10-15.
- [5] [德]M·兰德曼. 哲学人类学[M]. 彭富春,译. 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210.
- [6] 衣俊卿. 文化哲学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4.
- [7] [英]齐格蒙特·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M]. 杨渝东,史建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 [8] 王雨辰.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J]. 高校理论战线, 2011(8):27-32.
- [9]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5.
- [10]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7)[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1.
- [11] 邹国义. 国语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12] 徐志刚. 论语通译[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Formation of Cultural Pattern of Socialistic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ANG Xiao-yun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angn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56)

Abstract From view of cultural philosophy,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pattern has lasting and deep influence on the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Based on the complicated situation of worldwide ecological crisi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riticism on cultural pattern of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pattern in China and analysis on historic transformation through cultural pattern, this paper finds that cultural patter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 new cultural pattern after cultural pattern of both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pt the construction of two-oriented society or even to greatly rejuvenat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building cultural patter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aracterized with ecological harmony, people—orientation and harmony but not samenes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realizing transformation and overtaking of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pattern.

Key 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ultural pattern; environmental crisis; ecological justic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eco-reason

(责任编辑:陈万红)